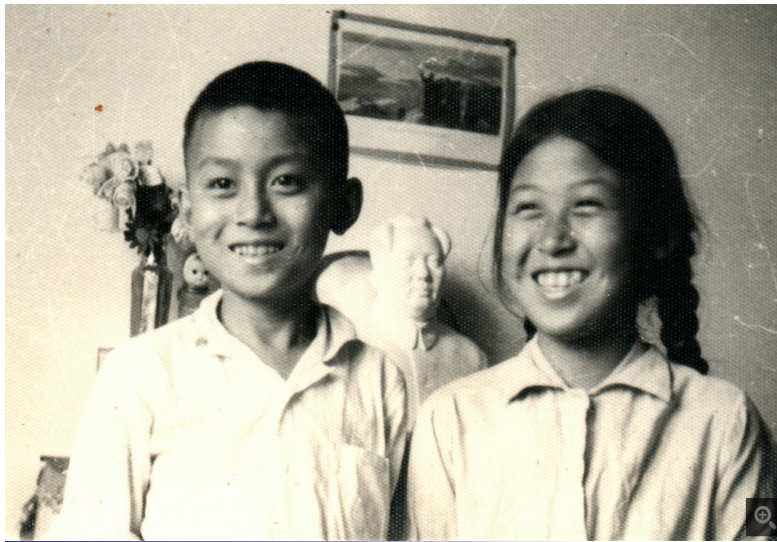


初心无悔 (下)



姐弟俩快乐生活在北京

1977年，母亲终于和我们相聚了。当时中国和印尼还没有复交，母亲是经香港在奶奶的陪同下从广州入境回国的。我们从1967年回国到1977年，整整十年没有见过父母，变化之大可想而知，估计当时妈妈恐怕也认不出我们了，毕竟在人生最为关键的成长期我们分别了十年，所以难免存在陌生感。但这种陌生感最终很快过去，在叔叔和奶奶的陪同下我们去了很多地方，到福建漳州见到了早在1960年就已回国的外公外婆及三个姨，回到北京后也一同游览了很多地方。短暂的团聚充满了快乐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，也感受到了外公外婆及奶奶对我们的格外疼爱，这种爱是刻骨铭心的。后来父母会隔三差五的来北京看我们，但都是分别过来，因为在印尼还有需要照顾的妹妹。那时的中国还处于物资匮乏时期，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

应，父母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经常跑到商店买回食用油等生活用品，以此来改善我们的生活，但他们在印尼的生活其实也很拮据。

1978年，中国刚刚恢复高考，这一年我高中毕业，但我做出了放弃高考的决定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自己做出的决定，促使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想尽快自立以减轻父母的负担。为此我的老师为我惋惜，我想父母如果在身边恐怕也不会同意，但我没有后悔。1978年10月，我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家建委建筑展览馆工作，现名为中国建筑文化中心，隶属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，这一干就是整整40年。

那时学校还管分配，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生分配的岗位都是工勤岗位，当时驾驶员岗位是大家趋之若鹜的岗位，对人的要求也较为严格。通

过努力，我非常荣幸地得到了这个岗位，取得了学习驾驶的机会。参加工作后，吃在机关食堂，住在单位集体宿舍，学徒期间工资虽少，但省吃俭用也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。由于生活已经基本稳定，我便有了找机会去学习深造的念头。1984年，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建设部系统招生，但必须要通过全国统一成人高考，还有另外的条件是科级以上的干部。虽然当时的我并不具备条件，但单位领导还是极力推荐我去参加考试，还特例让我脱产复习，巨大的压力随之产生。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，通过一个月紧张的复习我走进了考场。两天的考试令我紧张的透不过气，当我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时候如释重负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，毕竟又迈出了人生新的第一步。经过两年的在职脱产学习，我终于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专科毕业证书，毕业后又回原单位继续工作。

学生时期，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，从红小兵、少先队员、红卫兵到共青团员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南洛阳，一路走来都受到了老师们的关心和爱护和帮助，使我能够健康成长。参加工作后，在工作和生活上又得到组织和

领导的关怀、培养和帮助。考虑到我的归侨身份和当时的实际情况，在我刚刚工作两年的时候，单位特例向部机关提出申请为我分配了住房，使我真正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关怀。

从工人到转干，从科员到科长再到处长，从业务骨干到行政管理干部，从1975年12月加入共青团到198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。1989年以来开始兼职做侨联工作，从部直属机关侨联一届、二届委员到中央国家机关侨联一届、二届、三届委员，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侨联第六次、七次、八次、九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我和姐姐回国都50多年了，携手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。回头看走过的路，虽然艰辛坎坷，但终究没有偏离方向。如果要对自己的人生做个总结的话，我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出色，远没有超越我的前辈。比如说我的外公黄云峰，他从事海外华侨教育40多年，慈祥和蔼，德高望重，年老时依然每天坚持看书学习、听英语广播；比如说我的父亲沈慧争，他一生倾注于华文教育和传播中华文化，86岁的高龄依然在电脑前专注地写文章而耕耘不止。他们都是我的

榜样，目前我还难以望其项背。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也是对我影响较深的人，他就是我父亲的老师、曾任雅加达中华中学校长、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、全国侨联主席的张国基老师。我们是通过父亲与他相识的，他身居高位，仍生活简朴，性情淡泊，他的房间、床边堆满了书籍。每当我们去家里探望他时都会与我们亲切交谈，是一个慈祥、可亲可敬的老人。从他的一言一行中，我看到了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对党的绝对忠诚。

知道我经历的人都会问我：你那么小就离开父母回国，一定吃了不少苦，你不后悔吗？我的内心会说：做一个“又红又专”的人，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，这既是父母的期望，也是我们回国的初心，我们做到了，而且无怨无悔。

现如今，我们的祖国是日益强大的中国，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我骄傲，我是中国人！我庆幸，我能够生活在这么美好的新时代！我欣慰，我没有给我们归侨丢脸！（完）

沈小专（北京）

（写于2018年3月）